

谢民 剧作选

漓江出版社



《朝阳》剧照(广西话剧团演出)



1965年12月在北京。文化部周扬部长接见《朝阳》演职员。



《朝阳》剧照(广西话剧团演出)



《我为什么死了》在布加勒斯特舞台上。



《我为什么死了》(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

目 录

追求·探索·创新

- 试论谢民的话剧创作..... 胡树琨(1)

我为什么死了 (18)

一个火葬女工的情史..... (47)

微笑的梦 (61)

朝 阳 (112)

附:

《二十世纪中国话剧选集》

..... 罗马尼亚画报中文版(186)

罗马尼亚上演《我为什么死?》..... 广西日报(190)

中国戏剧在布加勒斯特舞台上

..... 罗马尼亚画报中文版(192)

青话演出《我为什么死了》..... 文汇报(196)

对三十五年话剧的思考 杜清源 林克欢(197)

论谢民悲喜剧的艺术探索 胡树琨(203)

立异标新二月花……

——看悲喜剧《我为什么死了》…… 沙叶新(219)

《我为什么死了》的悲喜剧性…… 林克欢(221)

谈《我为什么死了》的结构艺术…… 黎亦强(225)

《我为什么死了》导演札记…… 张应湘(232)

心里总有一个光点闪亮着

——读《微笑的梦》…… 吴 座(243)

说张草

——《微笑的梦》一析…… 高 今(246)

关于话剧《朝阳》的报章评论(存目)…… (252)

谢民和他的话剧创作

…… 张润增 李承炎 陈熙桢(254)

谢民是条热血汉子…… 陈肖人()

谢民创作年表…… (261)

追求·探索·创新

——试论谢民的话剧创作

胡树琨

谢民(原名杨学海)是广西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年剧作家。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生于山东掖县沿海渔村,父亲杨登洲解放前是上海的民主人士,曾为地下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大约是受父亲的影响,他们兄弟五人均先后效力于革命,解放前后偕同妻室全部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七年他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到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戏剧班读书,从此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期间,担任地下党的交通员,从小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四九年初入伍,参加了渡江战役。在部队曾任过文工团创作员、干事、参谋等职务。次年由部队保送到上海剧专编剧研究班学习一年,得到戏剧前辈陈白尘、李健吾等专家的悉心指导。后回到部队搞创作,一九五

四年转业分配到上海戏剧学院给李健吾先生当助教。这几年的时间他在工作中从李健吾先生那里学到许多宝贵的知识，为他后来从事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五九年作为支边人员调到广西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时逢刘少奇同志到广西视察，就半工半读教育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九六四年在全国正在兴起的教育革命的高潮中，谢民怀着满腔热情到南宁市五四工读学校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型话剧《朝阳》。剧本以其新颖的主题，生动的人物形象，受到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演遍全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个剧本显示了作者创作的才华。“文革”中，《朝阳》受到了批判，说是吹捧刘少奇，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谢民则被扣上“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帽子遭到迫害摧残，宝贵的光阴和创作的活力，被消磨耗费殆尽。一九七四年被迫下放到边远山区百色，他虽然无法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然而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则更敏锐深沉了。粉碎“四人帮”后，他被调到一所大学中文系任教，在那里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卷入了各种复杂的矛盾纠葛，接触了许多事情，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人，认真思索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属于他自己支配的时间虽然有限，但那思想解放产生出来的动力，却为他从自己的睡眠和娱乐中挤出了不少创作的时间。一九七九年前后，正是我们国家戏剧创作的鼎盛时期，特别是话剧创作，优秀作品接连地涌现。有严肃深沉的正剧，也有幽默辛辣的讽刺喜剧，惊心动魄、泣泪沾血的悲剧亦开始出现了，真是百花齐放，琳琅满目。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谢民创作的热情被燃烧了，他连续写了四个公开标明为悲喜剧之类的剧本：《我为什么死了》（载《剧本》月刊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微笑的梦》(载《影剧艺术》一九八三年第六期)、《一个火葬女工的情史》(载《影剧艺术》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另有一个剧本叫《亲爱的鹅卵石》,由于某种原因,至今尚未发表。一九八二年谢民调任《影剧艺术》副主编、主编。一九八四年被选为中国剧协理事、广西文联委员。

据透露,他这几年还写了一些反映现实、戏剧性很强的剧本。但自我鉴定,认为与已发表的作品相比,在艺术上没有多少明显的突破与拓展,愧于奉献给社会,于是,他便置于抽屉之中。谢民始终认定了一条创作的准则:必须是自己心血的结晶,必须体现自己的个性,必须在艺术上有所进步,否则,宁可“不发表”。

二

从六十年代至今,谢民发表的作品,数量是不多的。然而,他每创作一个剧本都力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而且一个比一个成熟。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自觉地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要通过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回答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而且要尽可能从比较大的方面去探索人生的哲理。在艺术上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要敢于探索,要勇于追求,哪怕是失败了,也可以总结教训鉴诫后来者。五幕话剧《朝阳》是他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大型剧作,一开始就体现了自己鲜明的个性,执著的追求。剧本写于一九六四年,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盛行并严重影响文艺创作的时代,反映的又是教育战线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重大

的社会主题，但是，作者并没有盲目地去充当“阶级斗争”的弄潮儿，人为地设置什么尖锐复杂的充满火药味的矛盾冲突，或者无缘无故地揪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或资产阶级代理人；也没有被流行的创作模式所框围，而是坚定地深入实际——到一所“五四”工读学校去与师生们“三同”，在近半年的共同劳动、学习的生活中，真正从那所“抗大”式的新型学校里感悟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从自己热爱的人物身上获得了创作的激情，在生活的沃土中挖掘和提炼出剧本的深刻主题，所以，这个作品当时在全国各地广泛演出，受到评论界和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边干边学的主题思想，仍然具有认识和借鉴的作用。特别是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如，工读学校的校长林恒，是一位有胆有识，朝气蓬勃，开拓型的年轻干部。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又能身体力行，和师生的关系非常融洽；他敢于坚持原则，又不以大帽子压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教育局副局长林原，是林恒的堂姐，在剧中是位对立面人物，剧本对她的刻画是很有分寸的。她有经验，有头脑，一开始就支持办工读学校，甚至也同意女儿刘秀梅到工读学校锻炼；但她办学的思想只有“正规化”，忽视甚至怀疑工读学校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干的办学方向，最终成了工读学校的绊脚石。剧本注意从生活实际出发，只强调她对教育改革中的新生事物认识不足，写得自然而真实，思想发展变化的层次也很清楚。其他几个青年学生，如林秀丽、刘秀梅、张思根、雷小虎等，写得各具个性，一个个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相当生动可爱。这就是《朝阳》至今仍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经历了十年浩劫，谢民对生活的观察思考更加敏锐深沉了。生活的浪潮经常冲击心扉，使他坐卧不宁，创作的欲望更强烈了。可是，他又不愿意重操过去熟悉而陈旧的形式和技巧，因为那“十八般武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他所理解和将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他广泛地阅读了中外古今为数不多的被称为“悲喜剧”的名著，于是开始对这类尚未定型，但独具特色的戏剧实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闯一条路子，为戏剧事业拓展一片广阔的领域。

谢民认为，从现有被称为“悲喜剧”的作品来看，它们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属于悲剧。其所以取得了悲喜剧的效果就是因为作家采用了喜剧的手法和情节，刻画悲剧人物，揭示悲剧的主题。所以，他认为，要写好悲喜剧，首先要对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的特征、性质、功能，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他严肃而尖锐地指出，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最优越、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但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包括社会的和个人的），悲剧因素确实存在着，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便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悲剧人物、悲剧事件，甚至某些先进人物也会遭至不幸，特别是那些顽强保持着自己个性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悲剧人物。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悲剧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予以克服纠正。这种克服和纠正就属于喜剧的结局。所以，谢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都是存在的，而且往往相辅相成，辩证地统一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悲中有喜，喜中含悲，悲喜交融，在人们的正常视野中并不是罕见的现象。极度

的悲伤，哭干了眼泪，反而容易使人沉静下来思考问题；苦难艰辛到了极限，也许就预示着鸿福将至，吉星在望；乐极生悲，过度沉湎于胜利，恣肆欢乐，得意忘形，终将走向反面。所以，谢民认为，大悲与大喜不是截然分开的。绝对的悲剧，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欣赏习惯来说，不是最好的悲剧；绝对的喜剧，纵欢狂乐，戏闹逗趣，换取廉价的笑料，必失之庸俗浅薄，不足称道。为此，谢民在学习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锐意求新，尝试以一种新的戏剧形式——悲喜剧来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这种新的戏剧形式，就其主要倾向来说，依然属于悲剧，但它不受正统悲剧的框囿约束，从表现手法上看，喜剧的色彩极其浓烈，但又不是—般充满情趣、轻松欢愉的喜剧。

《我为什么死了》(以下简称《死了》)发表时注明为“喜剧中的悲剧”，很明显，这里的中心词是悲剧。从剧情看，的确是一出典型的由夫妻关系演变的社会悲剧。只不过其中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都贯注和融入了喜剧的因素。剧中的女主角范辛的悲剧，就在于她生活于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动乱年月，理应处处设防，事事谨慎。可她对人(包括对上级和自己的丈夫)却是那样的轻信，对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赤诚热情。自己的丈夫夏俊，就是躺在身边的一条毒蛇，一条变色龙，一只有奶便是娘的巴儿狗，她竟然识别不了，看不出来，最后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丧生于自己亲爱者之手，仍始终执迷不悟，茫然昏昏。范辛这样一个纯洁可爱的女子，被自己的丈夫迫害而死，这对“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的揭露，深刻极了。范辛死而复生作为鬼魂出现在舞台上，慢慢觉醒，最后终于识破了丈夫夏俊的狰狞面目、

狼子野心。当然，这也算斗争的胜利，显示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仇恨与顽强的斗争精神：人虽然被迫害死了，变成冤魂，还要前来报仇！范辛作为悲剧的主人公，作者却运用轻松欢快的手法赋予她喜剧的性格，使剧情悲喜交融，显得格外凝重深沉。

《微笑的梦》(以下简称《梦》)的主题是净化知识分子的灵魂和解脱信仰危机。这样的主题，体现两代、甚至三代人的思索和追求所面临的抉择，所以，这里悲剧的氛围显得更为浓烈沉郁些。整出戏的悲剧因素，集中体现在全剧四个正、反人物身上。代加，曾是一个深入研究《资本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年知识分子。最后，竟经不住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诱惑，抛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当了金钱的俘虏、社会主义的逃兵，然而内心却极度矛盾与痛苦，以致精神失常了，这是个典型的悲剧形象。丘玉是一个心灵美好、品德高尚的女性。她能够理解人、体贴人，默默无闻地给别人一种信念和力量。然而，她却患了不治之症，一直爱着她的丈夫代加又无情地离弃她而去。从精神上看，她是富有的，是坚持政治节操的胜利者。而从遭遇和命运来看，她面临着生死搏斗，遭到失去爱情的沉重打击，她的前途，不可避免是悲剧的。薛思是剧中嘲讽鞭挞的形象，在她身上经常暴露出灵魂的肮脏、行为的鄙俗、言辞的丑恶，纯属知识分子的败类。从作品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里，我们分明感触到了作家的悲戚哀痛：同样的社会主义生活环境，一样得到党的培养教育，为什么会产生灵魂如此腐臭的人！像薛思这样的人，竟然得到教卫办全老头的赏识和庇护，一方面说明此人会耍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说明，我们的社会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滋生和助长各种孽障的官僚主义等歪风邪

气,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是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四化进程的。我们看到,谢民剖析这个卑鄙的人物,像咬着牙忍痛割掉自己身上一块正在腐烂的血肉,感情是很沉重复杂的。张草是作家着力刻画的党员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全剧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他身上。他是个有坚定信念和高尚品德的党员,物理学家,一位秉公无私、具有牺牲精神的党总支书记。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科学事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从不向党向人民伸手,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的一切。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却很糟。妻子是个追名逐利的学术败类、政治掮客,不仅不关怀照顾他,还无理地嘲弄奚落他,鄙视他,说他是“冷血动物”,“过时的符号”,最后竟以抛弃他为快事。他坚持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生活上低标准严要求,主动把应该属于自己的荣誉、物质享受让给别人,而原则问题决不让步,即使妻子要跟他离婚……张草的悲剧性就在于,他崇高正确的所作所为,被亲人歪曲嘲笑,被周围的一些同志所不理解,甚至造成了别人不应有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一向与他荣辱与共的代加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放弃了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抛弃了妻子,背离了亲爱的祖国;唯一能够理解他、尊敬他,给他以关怀和抚慰的丘玉,却患了不治之症,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与丘玉相爱、结婚,本来是一种幸福,可丘玉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他们的幸福,一开始就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尽管彼此都很高兴,但这种“刑场上的婚礼”,本质上却是苦涩悲痛的。

剧本在“梦(6)带苦味的果”这场戏里,写张草内心极度的苦闷,他在借酒浇愁,发出了深沉而愤懑的疑问:“……我在研究自己是否像薛思说的那样是个过了时的符号?我错在哪里

呢?!……远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当时,因为我有一些不满言论,还受到了隔离审查!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精神非常振奋,三中全会以来,我更是拼老命干工作!学校里的各项改革我都积极参加,不是我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政治思想建设都有我一份热汗在里面!我别扭在哪里呢?!难道不去抢、不去闹、不去争、不去吹、不去拍、不去钻就成了怪胎吗?!“我承认我的性格上有些别扭的东西,我好使闷劲儿,好拧脖子,可是我为什么使闷劲儿和拧脖子的?!可以直说,我对一些党风不正的表现感到生气,对一些不好的社会风气感到不习惯,对一些厚颜无耻的争名夺利的行为感到愤怒!这些造成了我的特殊心理状态,我老想和某些风气拧着干!我老想找别扭!……”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张草苦闷的根源,意识到造成张草这类知识分子悲剧的严重社会因素,从而升华和开拓了这部悲剧作品的深刻社会现实意义。

《一个火葬女工的情史》(以下简称《情史》)发表时注明为“悲闹剧”,表面上嘻嘻哈哈,滑稽逗乐,而它的内里却深深地蕴藏着一种哀怨和悲戚,客观艺术效果极其沉郁怆凉。剧中纯朴善良的女工阿欣,一生三番五次地受尽了县五金公司经理胖老金的玩弄欺骗,最后被当成绊脚石踢开——塞到火葬场当工人。说是组织决定,革命工作的需要,实际上这是一种迫害。像阿欣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既无自卫能力,又不善于利用关系学寻求靠山,有苦说不清,有冤无处伸,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直到这位权势者胖老金的尸体送来火化,她才有机会发泄胸中的积怨,倾诉满腔的愤懑。从表面看,阿欣总算是报了仇,解了恨,显得人心大快。但嬉笑

逗乐之中；人们却禁不住溢出了凄惶悲怆的泪水，因为那报仇解恨的情景竟发生在迷茫昏蒙的梦中，显得多么荒诞离奇不切实际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谢民之所以立志用喜剧的形式来写社会主义的悲剧，不仅是为了使悲剧不至于太低沉、太悲伤；有利于读者和观众能够冷静下来进行必要的思考，从中得到理性的启发，吸取生活的教训，实现灵魂的净化；更重要的是，这样更能准确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展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

体现作家悲喜剧因素融合的创作构思的关键，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典型的悲喜剧人物。过去的所谓“悲喜剧”作品，往往只是局限于在悲剧作品中采用了某些喜剧的手法，或安排带有神话色彩的夸张幻想的情节。而在人物的性格气质上，着意地将悲喜因素融合在一起，还是罕见的。谢民一开始就给自己确定了崇高的创作追求：要努力塑造出具有悲喜剧性格的典型人物。

《死了》等三个剧本中的主要人物，在性格气质方面悲喜剧因素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是随着作家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在逐步加强，趋向统一、和谐、自然。

《死了》剧中的青年女子范辛，从她的命运和遭遇来看是